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

(第四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一本卷主编／王戎笙



方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清代全史（第四卷）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本卷主编 王戎笙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全史. 第4卷 / 王戎笙主编.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7.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ISBN 978-7-80238-025-7

I. 清…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717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清代全史 (第四卷)

本卷主编: 王戎笙

责任编辑: 李 沛

出版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9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238-025-7/K·797 全套共 10 卷 定价: 56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再版前言

《清代全史》1993年7月初版，1995年2月第二次印刷时，对初版纸型进行过少量挖改。其实在1993年7月之前，1~6卷还印过一次，所以有的书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91年7月第一版”及“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字样。

《清代全史》这次再版，按常理说，是一次推出修订版的大好时机。但在和出版社洽谈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内容不作修改。这倒不是自认为没有修改必要，而是没有充裕的修改时间。与其匆匆修改，不如不改。当年同甘共苦的同事，有7位已先后离开我们，目前健在而且有精力从事笔耕的同志，手头都有繁重工作，请他们立即腾出手来修改旧作是有困难的。

《清代全史》所定的奋斗目标是，写出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有新的突破。经过十几年的检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立项时所定的奋斗目标。

《清代全史》邀集了祖国大陆几十位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虽然都不是通才，但对清史中的一些领域，有长期从事专题研究的基础。分工承担《清代全史》中的相关章节，写来自然能反映那个“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

这个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管，由我负责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立项最初几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拨给研究经费，从1987年起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当时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科研经费很少，平均每年不过两万元。我们开会，是在近代史所的招待所，不论名望高低，都是两人一间，吃饭都在近代史所食堂。各分卷主编，要承担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稿酬外，没有拿一分钱的主编费。所有撰

稿人除了资料费和文具费外，没有其他开销。艰难玉成了我们，也是前辈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我们，使我们能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

清代的历史，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中国被突然卷入了世界潮流。一个以弯弓跃马崛起的满族建立的大清皇朝，面对着以战舰火炮先后崛起的几个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这些陌生的来客崛起后便到中国叩门，频繁使用通商、外交、传教、战争等手段，对中国巧取豪夺。用什么样的政治智慧应付这种局面，是摆在清政府面前最严峻的难题。应付这种局面的历史，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研究对象。中国何以落后挨打？这是清代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清代全史》就这些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至于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翘首以待未来的清史论著。

民族问题，是清代历史中最重要而且最复杂的问题。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清代全史》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多方面的关系。对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性的叙述。

《清代全史》用了将近十分之三的篇幅叙述清代的经济，而且是由长期研究清代经济的专家们撰写的。广泛涉及清代经济的各个方面，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区域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边疆经济开发，以及对外贸易，都有比较充实的内容。

在《清代全史》立项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习惯于把清史的下限定于鸦片战争，道光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历史，则属于中国近代史。由于这个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0余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作为断代史的清史问世。而中国近代史，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以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结构。《清代全史》作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奉献给读者，首先必须突破多年来形成的近代史模式。这种突破，其真正意义在于为此后编写完整的清史断代史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见解。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大协作，最明显的优点是每一位撰稿人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内有长期的积累，有较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起点，为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因素，最主要困难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如何消除分歧保持一致。我们在摸索中采取了一种办法，现在看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召开分卷主编会议，并邀请出版社的负责人参加，讨论涉及全书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讨论，亮明各自的观点，发现分歧所在，寻求协调一致的途径。现在看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我们也碰到过一些虽说不大但很难办的问题。外国国名、人名、地名、书名，兄弟民族族名、人名、地名、书名，有各种不同译法，史籍中各行其是，很不一致。凡加了引号的直接引文，原则上是不改的。但对兄弟民族的蔑称所加的“豸”字偏旁，对外国国名、人名所加的“口”字偏旁，我们径直改正不加说明，这是学界惯例。但有一些译名，例如人名，哲布尊丹巴，又称哲卜尊丹巴，又称折卜尊丹巴，也称泽卜尊丹巴。再如地名，“勒通”藏语汉译为理塘，又译里塘或李塘。再如国名，现称俄罗斯，过去称鄂罗斯，或称罗刹。如果以为“罗刹”不雅（特别在佛经里）改称俄罗斯，那《平定罗刹方略》，该改成什么书名？如何全书保持一致，有惯例可循的好办，没有惯例可循的，我们只好按史籍原文照录，不去强求一致。我们遵守了这一规则，却违犯了另一规则，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撰稿过程中，我最忧心的是学术质量问题。待到快要完稿时，我最忧心的却是出版问题。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时期，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申请出版补贴那时还没有先例。在这个存亡关头，辽宁人民出版社慨允资助出版。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不能出版，几十位学者辛勤工作的成果，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在《清代全史》再版时，饮水思源，我们要对辽宁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再版，需要重新录入，进行电子排版，编辑工作，一切从新开始。但在电子排版中存在一键之差，往往错成一片的情况。工作量大，时间紧迫，方志出版社的李沛同志、徐宏同志和颜伦琴同志，为此书的再版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有时甚至节假日也要继续工作，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真诚的敬佩和感谢。

王戎笙

2007年3月13日

前 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 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 1000 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订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 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编纂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 1983 年起，到 1990 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 8 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十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 20 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清代全史》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宓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

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闳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9)
第一节 雍正即位	(9)
第二节 加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	(22)
第三节 军机处的设置与职掌	(36)
第四节 雍正的施政	(47)
第五节 加强政治思想控制	(59)
第二章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	(70)
第一节 乾隆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70)
第二节 经济、文化政策及其成就	(90)
第三节 乾隆后期的统治	(104)
第四节 厉行政治思想控制	(114)
第五节 政权机构和政治法律制度	(126)
第三章 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147)
第一节 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	(147)
第二节 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和武装反清起义	(162)

第四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统一	(190)
第一节 青海及天山南北地区的统一	(190)
第二节 进一步统一西藏	(211)
第三节 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228)
第四节 剿抚苗疆与苗民的反抗斗争	(246)
第五节 平定大小金川	(257)
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概况	(276)
第一节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概况和相互间的友好联系	(276)
第二节 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和宗教政策	(313)
第三节 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管辖的加强	(324)
后 记	(333)

绪 论

—

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动荡之后，接着出现了一个盛世局面。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学术文化昌盛的时期。整个学术界，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考古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历算等等，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初叶，作为儒家学说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理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但是，产生儒家学说的社会环境却并没有消失。因而，伴随着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儒家学说也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反映。这就是经历康雍两朝的理学崩解之后，汉学即考据学的兴起。考据学勃兴的原因，一说由于文字狱，一说由于康乾盛世，一说由于清初西方实用科学输入的影响。这些都是对的，但须要补充。考据学的勃兴，以致最终取代理学的地位，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则是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因素。

清初反理学思潮是一个力图挽救社会危机、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潮。它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重大意义。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等人。经世致用的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既有别于以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清初反理学思潮也是一个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试图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思潮。以经学取代理学，清初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也未能突破历史和阶级的

局限。他们的理论探索，终究不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当面临着以什么新的理论去取代理学时，他们只能从古老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可以借鉴的思想材料，只能是儒家学说中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经学。历史在前进，这种缺乏生命力的取代，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政府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经世致用逐渐衰减，以致到乾隆初叶丧失殆尽，朴实考经证史愈益成为这一思潮的主要方面。反理学思潮遂蜕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至考据终的复古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也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界都曾发生重大影响。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罗织罪名的手法，也最为奇特。

康熙朝著名的文字狱是庄廷铨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因保存胜朝信史而招来大祸。这个时期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是具有眷恋故国之情的知识分子。虽然大批无辜者株连被害，但狱案却是事出有因，并非人为的假案。由于株连广泛，用刑严酷，具有很强的威慑效应，使私家修史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情绪被压抑在内心深处，不敢有任何表露。

雍正朝的文字狱，有许多是与统治集团权力斗争有关，往往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还有许多案件是由荒诞的推理罗织成罪的。真正谋反有据的，只有曾静一案。雍正帝却利用此案扩大打击面，制造恐怖气氛，充分发挥了威慑效应。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文字狱不仅使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亲友以及无辜株连的工匠商贩，惨遭杀害或流徙，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取证又是捕风捉影，以至人人自危，避祸唯恐不及。文士的智慧和才华，被禁锢在小而又小的牢笼里。在这种极端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理智地去思考问题，不敢就任何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吐著述，远离现实，或潜心于考据，或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思想控制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刚柔互济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现，是在大兴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同时，又大兴文教，罗致人才，编纂图书。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成效之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诩。除大力倡导外，还身体力行，勤学不懈。屡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博采典籍，访求遗书。由于他们崇尚儒学，故搜求的重点在经学史乘，并把这些图书看作是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的大事。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资料宏富，查核方便，是现存古代最大的类书，被现代学者誉之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全书。乾隆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包括了先秦至清初重要文献典籍，整理时虽有删改抽毁，但保存古籍之功是主要的。参与其事的4000余人，其中包括戴震、王念孙、翁方纲、姚鼐等名儒300余人。在古籍整理方法、校勘、辑佚及目录学等方面，给后世学术界以极大的影响。盛清文化事业的成就是辉煌的，名儒辈出，著述如林。整理古籍规模宏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总汇。但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是复古的、守旧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总结。

雍正三年（1725年），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编成。30年后，法国狄德罗（Didelot）主编的百科全书出版，并形成一个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康熙皇帝敕修的“百科全书”，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而后者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专制的批判者。当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的时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的时候，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禁锢士子思想的时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大兴思想解放、开展启蒙运动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一个多世纪以后才陆续传入中国。

二

自秦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明清，特别是清代的雍乾两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封建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皇帝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和全体子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根据皇帝的意志办事。皇帝掌握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权。全国军队完全置于皇帝的绝对控制之下，防止任何人拥兵自重。皇帝亲自参与或修改法律，亲自审理重大案件，终审判决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宣布对犯人特赦或减刑，皇帝的指示高于一切法令法典，皇帝实际上拥有立法、司法和废止法律的大权。

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和最丰富的物质享受，因此皇位继承权成为宫廷斗争的中心内容。在清代，皇位继承方式几经变迁，由最初王大臣议立过渡到遗诏立储，历经预立太子的失败后，最终确立了秘密建储的制度。这是皇位继承制的新突破，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它的新意在于扩大了选择继承人的范围，在皇子中不分嫡庶长幼，选其贤能者立之。而且从实践上看，雍正后 100 多年几次皇位转移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平稳地完成的，没有出现争夺皇位的大动乱。秘密建储还可避免嫡长子继承制明显的缺点，诸如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从小就受到臣下的奉承谄媚，很难有发愤图强的进取心。密建皇储则不一样，谁是继承人只有皇帝一人知道，有可能刺激诸皇子去建功立业；但这毕竟是走上了穷途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我完善的一种努力。任何一个英明的君主也未必有力在诸王子中选择一个贤德的继承人，而昏庸的皇帝独自秘密选定的继承人，绝不可能是适宜的人选。这就给野心家提供了“窥窃神器”的机会，清代后期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雍正时建立的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其成员由皇帝随时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特简”，无定员，非专职，是皇帝信任的、熟悉政务而且干练的重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军机处在皇帝的严密控制下，极端机密地进行工作。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亦不得侍侧。一切官员均不得进入军机处值房。有些重大军机政务，内阁也无权过问。军机处成员不准与部院官吏及督抚、将军交往。军机处是清代特殊的政治机构，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一切事务，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

由康熙创始、雍正进一步加强的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皇帝要求全国身任要职的大臣（雍正更扩大到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以至个别特许的中下级官吏），不分职务内外，凡所知所闻，有关政治、经济、舆情、吏治等，不便通过正常途径上报的都写成密折。奏折

内容十分广泛，盛以特制的木匣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开拆、阅览和批示。皇帝的朱批也通过同一渠道下达，定期收回，各官员之间绝对不许言及奏折及朱批的内容。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为皇上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国家统一、民族和解、社会安定、边疆巩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与“文景”“贞观”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它的某些成就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无法比拟的。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和无与伦比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相互依存并互为因果的。在封建社会晚期，如果不是专制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就不可能排除元老重臣的掣肘，清除藩镇割据，制止民族分裂，国家不能集中财力用于治理河患、平定叛乱、抵御外敌，当然就不可能出现前面所说的盛世局面。

康雍乾虽说出现了百年盛世，但已是进入封建社会晚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创造空前业绩，但无法解决封建制度本身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反而由于专制政治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探索与追求精神。率由旧章，是天下臣民的共同信条。变革，哪怕只是产生一个念头，也是舆论道德法律所不允许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切都是现成的好，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最美满的，不藉外洋货物以通有无是天经地义的。不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不鼓励工商业，不大力鼓励对外贸易，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甚至自我封闭于国际社会之外，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造船航海事业停滞，万里海疆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科学技术落后，学术思想禁锢，都怡然自得。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洋火炮，明知其威力强大，但不思精益求精，以致在道咸以后又以极大代价再次引进别国的新一代洋枪洋炮。头绪纷繁的经济现象，陌生的西方文化，与外国殖民主义办交涉等等，许多都是老祖宗没有解决过的新问题，没有成规可循，而且一切由皇帝一人做主。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而新思想，新见解，新知识，新办法，又受到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世界文明史上一直是遥遥领先的。17世纪中叶，除个别单项外，从总体上说，仍不落后于西方。到了历史上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时期，欧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正以空前

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加速海外殖民掠夺。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这个高潮促进了造船、航行事业的飞跃发展，从而又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天文、力学、机械、物理、数学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却在这个时候，明显地落后了，而且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英国在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工业革命已取得巨大成就，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蒸汽机在纺织工业中迅速推广，由此引起采掘、冶金、机器制造部门的技术革命，并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当时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当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神州大地上正在进行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英国完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大变革，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于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1787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以及179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关于人权的补充条款），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这些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形成的著名文件，集中反映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政治学说，如三权分立、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等。

18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封建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文字狱的恐怖使思想界沉寂。全部政治生活准则，一切法律条文，数不清的道德规范，都毫不含糊地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这种君主专制制度，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才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三

清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虽一度有过重大失误，但它在民族政策上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它在中央机关中设立特别行政机构——理藩院，管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清代中央官制，大体沿袭明制，理藩院却是新创。首脑由满员担任，拥有较多的便宜行事之权，并有权指导驻边将军、大臣。组织严密，职掌分明，不受其他机构

掣肘，行政效率之高为六部所不及。理藩院前身为蒙古衙门，早在崇德年间便已创立。这说明满洲贵族在新兴时期就十分注意处理兄弟民族间的关系。他们利用联姻、结盟等方式，与部分蒙古部落首领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注意力转向北方。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多伦诺尔厅（今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举行会盟，曾遭准噶尔部噶尔丹攻掠的喀尔喀蒙古各部贵族35位首领参加会盟，朝觐清圣祖。康熙帝妥善地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长期纷争，改革了喀尔喀蒙古的行政制度，促进了喀尔喀重新统一。对准噶尔部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康熙帝多次亲征，嗣后历经雍正、乾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大武功，虽不能算是十全，但有七次战争是正义的。这些战争有利于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有利于祖国的进一步统一。康雍乾三朝还采取积极措施，开发边疆地区，发展农牧业生产，繁荣经济，实现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的大难题。长城内外，天山南北，兄弟民族间和平交往。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历代维修的万里长城失去了军事屏障的意义。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

对西藏地区，自努尔哈赤称汗开始，便采取尊崇喇嘛教的政策。西藏与后金，使节往来，不绝于途。入关以后，清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密切。顺治帝多次遣使往迎达赖喇嘛，达赖、班禅也多次遣使献礼颂德。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喇嘛入朝，清世祖派亲王、大臣远道迎送，赏赐丰厚。康熙年间藏蒙各派政治势力爆发争夺权力的斗争，康熙帝为稳定边疆形势，对各派势力采取调解态度，支持一切忠于中央政府的派别，终于平息了各派纷争，提高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各派地方势力中的威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西藏遭准部策零敦多布偷袭，劫掠烧杀，侵害寺院，严重破坏了西藏社会秩序。康熙帝两次派军平乱，彻底击溃准噶尔军，护送六世达赖喇嘛入藏。乾隆末年，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抢掠寺院，清高宗派军进藏大举反击，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全部逐出国境。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这是清政府统治的又一伟大历史功绩。

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长期实行土司制度。这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